

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探索

——罗郁聪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

苏 振 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反思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继承和弘扬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为探寻“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精神,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从而探索开辟出一条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薄一波同志曾把这一继往开来、艰辛探索的历程,概括为“始于毛,成于邓”^①。

为了推进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在党的领导下,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一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论证大军”;一批研究邓小平理论的高水平理论成果、学术专著脱颖而出。罗郁聪教授的新著《现代社会主义论》,就是为论证“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国特色”这一主题而出版的一本专著性的文集。他围绕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想出发,认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定要从资本主义的不同发达程度出发,主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大体上可分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各具特色的类型或模式,并强调要从世界历史变革和发展规律的高度,来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时兼顾到对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的普遍适用性。他紧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构想,列宁、毛泽东的探索实践,把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进一步表述为:“始于马恩,继于列毛,成于邓”^②。这在学术理论界可以说是首创的理论观点。这一崭新观点的提出,对推动人们从更广阔和更深层的理论背景上,理解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

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别具一格的理论著述

罗郁聪教授早年在厦门大学经济系求学时,师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熏陶。解放后,他继续在高校从教,现已五十多年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焕发出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青春活力,在从事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反杜林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的同时,遵循列宁关于“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③的教导,把理论研究的侧重点放在探究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上。他先后于1985年,1987年,1990年相继出版了《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恩格斯与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研究》(与人合著)等三部研究恩格斯思想的学术专著,形成一套“系列丛书”,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先后为其作序或写书评,高度评价上述专著是“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包含了许多创造性见解”,有的见解,如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和发展阶段的论点,在我国学术界还是首次提出的,“在众多‘研究’中是别树一帜的”;对恩格斯经济思想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开启先河”的意义。

与此同时,罗教授还十分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基本原理,分析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用

^① 参见薄一波:《学习邓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上的讲话》,1994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② 罗郁聪著《现代社会主义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6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94—95页。

他自己的话说,是“抱着坦诚祈求,希望我国改革开放实践能够获得健康发展的心情,密切观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反复思考,倘有一得之见,成熟一个问题写一篇文章,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①。这样,从1979年开始,二十年来他先后公开发表了25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自然地形成了一套以“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国特色”为主题的系列论丛。

现在,罗教授将这些系列论文汇集成书,山西经济出版社“以专著形式”出版了这本“文集”。其内容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以“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国特色”为标题,分成“方向”、“道路”、“目标”、“展望”四组,收入上述25篇文章。在每组文章之前,作者又专门写了或长或短的“增补”,粗略勾勒出该组文章的中心思想及内在联系,同时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见解,表明作者新的认识水平。“增补”的作用还在于显示文集的立体感和现实性。二是以“对恩格斯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的阐发”为标题,收入了《反杜林论研究》一书中的第15~21题等七个系列专题,对《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编的内容作详尽和系统的阐发。三是在一、二部分之前,作者还以“前车之鉴与走自己的路”为标题,新撰写了长篇“引论”。在探索、分析原苏联改革的经验教训和导致国家解体的深层原因的基础上,进而阐发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过程,总结成功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会。此外,作者还在“前言”、“后记”中表明了自己作为建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论证大军”一员的执着志向。

这部颇具匠心的“文集”的编辑出版,凝聚着罗教授二十年来的心血和理论成就。这部“以专著形式”出版的“文集”和三本“专著”,深刻反映和折射出罗教授的学术思想,表明他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治学历程,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感和理论立体感。

二、精辟独到的学术见解

罗教授在这本“文集”以及三本专著中,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国特色”这一主题,提出并阐发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学术见解,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经济改革观”。有不少见解和观点,在我国学术界是首次提出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反响。

首先,他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和发展阶段问

题有着独到的研究。早在1979年,罗教授便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读A·M鲁缅采夫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的一些体会》两篇文章,就马、恩、列和毛泽东以及原苏联专家学者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可以再划分阶段的理论观点,联系我国实际情况,明确表示赞同“我国社会目前处在‘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论点,并指出所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还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国社会是处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尽管那时仅是作为学术探索,还未得到公开认可,但可贵的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并逐渐使之完善与成熟。80年代中、后期先后出版的三本“系列丛书”中,他分别对此作了更系统深入的论述和阐发。他从马、恩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再划分阶段的论述,扩展到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并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俄国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两条各具特色,大不相同的建设道路和发展阶段。这样的理论观点,除了体现在上述文章和三本专著中之外,还集中反映在罗教授1988年发表的《两个基本点必须统一在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一文中。该文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②。在这里,他把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与建设道路内在地联系起来,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辩证地统一起来。

1995年至1997年,罗教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试探》、《现代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三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启示”的系列文章中,进一步根据马、恩关于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构想,借鉴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尝试性实践,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阶段的理论构想,明确指出必须从资本主义的不同发达程度出发,来寻

① 罗郁聪著《现代社会主义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页。

② 罗郁聪著《现代社会主义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94页。

找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两种各具特色的类型和模式。经济落后国家虽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会经历更多阶段,更长时间。他分析说,处于发展中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正是马、恩所指引的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建设道路。生产力的相对落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封建宗法意识的厚重,使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上,必然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以完成本应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的过程。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由于种种内部条件的限制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社会主义各国不同程度地都存在着操之过急的超阶段发展的倾向,这样,社会主义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严重失误,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而不得不先后踏上改革之路。为此,我们应当从各国实际出发,历经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或不发达阶段,逐步推进改革,努力建设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

总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想,由于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不同,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大体上有两种各具特色的类型和模式。对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来说,虽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向社会主义转变,但其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必然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去完成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罗教授看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特色”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和发展阶段上,认清“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国情的最大实际,坚决“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最大特色所在,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突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他反复强调:“我们所探索的新路虽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是独指我国国情而言的”,然而我们的改革一旦成功,至少对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切发展中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具有“可供参考的普遍意义”^①,“我们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的开路先锋”^②。最后,罗教授总结说:“如果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当我们集中注意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体系的同时,必须兼顾到对资本主义不发

达的经济落后国家的普遍适用性,而且要进一步提高到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要从世界历史变革的高度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据此,我们才能说,从理论内容上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思想资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整套理论观点,换言之,也就是‘始于马恩,继于列毛,成于邓’。据此,我们才能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现代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坚持和发展。”^③显然,这是经过多年锲而不舍地探索研究,才得出来的科学论断。它不仅深刻论证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而且科学评价了这一理论的世界普遍意义。

其次,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对立与兼容的关系问题。罗教授根据自己长期的理论研究和理解,在他撰写并收入这本“文集”第三组的七篇文章中,比较客观地提出了他的独到见解,并作出科学的论证。他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商品经济“解体作用”的分析》,特别是《社会主义意义的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比较优势》等论文中,强调指出:应把原苏联和我们过去搞的所谓“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跟马、恩、列提出的“原来意义的计划经济”概念区分开来。他指出,马、恩在构想未来社会时,把产品社会运动状态描绘为全社会是一个中央有权威,企业要自治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自觉行为。列宁据此思路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是一个同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运动表现为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概念。斯大林由于客观历史条件和世界形势的限制,加上主观认识不准确,急于求成,超越阶段,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偏离。这就是原苏联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所实行的被扭曲了的“传统计划经济”。它的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把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罗教授在具体分析基础上认为,在抽象概念上,未来社会的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是对立的,不可兼容的;而在我国现存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上,二者是可以兼容的,而且一定要兼容。

① 罗郁聪著《现代社会主义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96页。

② 罗郁聪著《现代社会主义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0页。

③ 罗郁聪著《现代社会主义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65~166页。

在兼容中发展社会生产力; 发展资本主义, 更发展社会主义。

当今, “市场经济在全世界已占统治地位, 国际间的交往几乎完全通过市场。在这种形势下, 我国不仅实行对内开放, 而且实行对外开放, 这是正确的。但是,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对外开放不仅是分工合作, 互通有无, 共同发展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 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国际交往和世界历史的辩证关系, 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上所达到的新成果, 学习垄断组织经营管理的先进经验, 这样才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 并继续向更高阶段发展。”^① 罗教授在这段精辟论证基础上, 发人深省地提出这样的警句: “可以说, 不懂得这样做的人, 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过, 如果倒进资本家的怀抱, 将会适得其反。不能不提高警惕。”^② 与此同时, 他还指出, 通过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可以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可是, 搞得不好, 也有可能影响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 在主要是防止“左”的前提下仍要注意警惕右。比如, 在充分运用商品经济“解体作用”的积极面的同时, 要注意限制商品经济消极方面的“解体作用”。为了保持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更有利于巩固其主体地位和发挥主导作用, 他还积极建议在国有经济范围内试行“原来意义的计划经济”, 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 这就如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实行公司制的“内部贸易”一样。这样, 既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又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既增强了活力, 又可端正动力。他认为这样的实践, 更能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罗教授经过长期探索研究, 深思熟虑后阐发的这些学术见解和建议, 是深蕴辩证理性思维的真知灼见, 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三, 在展望未来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时, 罗教授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行扬弃”》、《资本论 第三卷增补的启示》等论文中, 具体分析了马、恩对股份化和交易所的作用的论述, 并概述了商品经济“解体作用”的四次历史显示——土地商品化、人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以至资本商品化过程, 是“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发展的过程”。并指出在历史上, “商品交换先于商品生产出现”; 而展望未来, 相反地, “商品生产将先于商品交换消失”^③。他认为, 从发展趋势上看,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都采用同样的实现形式

和市场经济体制, 这似乎是一种“趋同现象”。但是, 我们的国有经济是由人民共和国依靠劳动人民群众来掌握的。因此, 从内容上看, 二者却存在着根本性质的差别。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意义的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比较优势。

虽然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自然而然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罗教授指出, 实践证明以国有独资责任有限公司和国家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 既能够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动力, 又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而且这种活力和动力不是分散孤立的, 而是从整体上看; 整体的活力和动力, 自然表现出统一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自觉行为。这种在国家宏观调控下, 统一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自觉行为, 在市场竞争中能站得高看得远, 观察供求情况, 遵循价值规律办事。追求利润是正当的, 积累是社会进步最重要的职能。然而, 我们不是唯利是图, 我们的动力是求解放, 获发展; 通过国际市场, 我们要吸取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先进成果, 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谋求全人类解放和可持续发展! 这样, 便深刻论证和阐发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应当也完全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这一论断的科学性, 使人们更加坚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是一个伟大的创举”^④。

以上只是列举了“文集”中属于唯物史观的“理论终结”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中比较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一些富有创见的独到见解和观点。至于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基础”的唯物史观, 罗教授也有一些独到见解。比如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试探》、《第二组文章增补》、《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行扬弃”》以及《暴力革命与革命的和平发展》等论文中, 曾谈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作用的初期形态、典型形态和后期形态三种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扬弃论不是资本主义自行消亡论”, “无产阶

① 罗郁聪著《现代社会主义论》,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 第164页。

② 罗郁聪著《现代社会主义论》,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 第165页。

③ 罗郁聪著《现代社会主义论》,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 第218页。

④ 参见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

级取得政权的方式有暴力革命和革命的和平发展两种可能性,哪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由客观局势决定。”等等。此外,他在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在相互联系中确立了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时,特别强调了“通过剩余价值揭发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个“中心”;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所以,罗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价值命题的比较研究》、《商业纯粹流通费用补偿问题研究》、《资本论 第三卷增补的启示》等论文中,还深刻阐发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他还拟著文继续探究这一重大课题。我们期待着罗教授的更深邃的学术观点和科学著述面世。

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理论

罗郁聪教授是一位具有坚定信念的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笃信王亚南大师关于要“以中国人的资格”或“应当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箴言”,坚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文集”的前言中诚挚地坦露自己的这一心迹,说:“我今年已经76岁了,从青年到老年,整整半个世纪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一辈子教师。50年来自认为尚能读书不唯书,尊上不唯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①这段话也是对他五十多年来“所走过的路”的一个很好总结!五十年如一日,做到“读书不唯书,尊上不唯上”,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而能够做到不仅“整整半个世纪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坚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则更是令人钦佩的。

罗教授长期从事《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研究,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钻研精深,理论功底非常扎实。对此,我是有深切体验的。在1988—1990年间,我跟他合作撰写《反杜林论研究》,彼此互相审读各自写的书稿,深深感受到罗教授对马、恩著作钻得深,很熟悉,做到耳熟能详,写作时能广征博引,知识面广博。因此,他不论是写专著还是写论文,都能非常老到地引经据典,严密论证,做到无懈可击,令人叹服!1990年8月~9月间的一天,我因校阅书稿清样到罗教授家,他正患重感冒,发高烧,卧床病休。我便独自在他书房搬出他书架上多卷“马恩全集”来校核《反杜林论研究》稿,竟然发现所有“引

文”;在“全集”中不论是“论著”还是“书信”,重要的观点、章节、段落他都一一圈点点点,红线黑线作了许多勾画、批示。因此,我一对照,很快就核对应出所有“引文”的“出处”来。从这可以看出,“马恩全集”中的许多“著作”、“书信”,他不知反复研读过多少遍了!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功底,他在写作时,才能够那么得心应手地引经据典,并准确、严密!罗教授博大精湛的理论功底,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从心底里油然而升起一股崇敬之情!

罗教授很强调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无论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以尊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意为前提。在“文集”第一组文章“增补”中,他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引经据典是很自然的,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既不能当‘凡是派’,也不能歪曲原意或把无中生有的东西附加给马克思恩格斯,从而搞乱专有的范畴、概念。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必须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但是,发展也好,修正也好,都应当以尊重原意为前提。”^②因此,一定要以诚实的科学探索精神来对待科学的理论。这样,对理论和实践才能有真正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就以如何看待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问题来说。当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央锐指出:土改后农村到处出现新富农,两极分化现象严重,贫下中农埋怨共产党见死不救。罗教授1982年写的《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根据大量调查研究实际材料表明,土改后中国农村阶段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要标志是“中农化”。新富农和两极分化现象在一些地区是存在的;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它的趋势“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因此,罗教授认为,毛泽东当时对1955年上半年以前农村形势的估计,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个错误导致了1955年下半年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罗教授还指出农业合作化高潮打乱了原来的“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规划和部署,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上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和错误。文中虽没直接指名道姓,但批评是直率坦诚的。如果说,这是“尊上不唯上”的

① 罗郁聪著《现代社会主义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前言第3页。

② 罗郁聪著《现代社会主义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4页。

一个实例的话;那么,在如何对待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问题上,则表明罗教授坚持“读书不唯书”的科学精神。他在《关于资本论中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文中,根据美国出现“公司化的农业”或“农业公司”的实际情况,指出垄断资本不仅通过贷款直接深入控制“家庭农场”,而且使它同农业前部门和农业后部门结合起来,从而使它融合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农业公司的一个“车间”。罗教授认为,这是农业资本垄断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或过程。他在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研究中,还注意到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既出现雇佣工人的绝对减少,也出现雇工在农业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提高的情况。据此,罗教授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谈到这个情况,但是,他曾告诉我们:“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因为资本的利润本来不是靠减少所使用的劳动得来的,而是靠减少有酬劳动得来的。”^①这也就是说,雇佣工人绝对减少的趋势,并不是取消资本主义农业的主要标志,反而是资本主义发达的表现。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的主要标志与农业中雇佣工人绝对减少的趋势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应当考虑依据当代的新情况有所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科学的、郑重的态度。

再以如何正确理解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命题来说。马克思设想重建的“个人所有制”,究竟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是生活资料所有制?应当怎样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探索和回答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罗教授1983年写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辨》,详尽地引证了马、恩的有关论述,澄清关于“产品即消费品”的真实本意,以说明要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应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反驳了人们长期沿袭下来的把它说成是指“生活资料所有制”的习惯性说法。但令人不安的是,新的看法竟成了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理论”依据?为此,罗教授在1990年又写了以《论社会个人的所有制》为题的“再辨”文章,详尽地引证和对照了不同版本的《资本论》,特别是马克思亲自修订出版的法文版原文的原意,澄清了要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是指“社会个人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即“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不会为“私有化”提供论据!祈望把问题的讨论引入正轨。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几篇文章认为,如果不把“个人所有制”和

生产资料脱钩,“私有化”的理解就不可避免,只有与生活资料联系起来,“个人所有制”才有独立存在的真实意义,似乎又回到传统的习惯说法上去了。这就促使罗教授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这一命题。他深感“理解经典著作的关键,在于力求符合原意”^②。为此,1992年,他又写了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进行辩证思考的表述》为题的“三辨”文章,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方面,紧密结合马克思所做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进行哲学的探索,力求做出既符合马克思原意,又能够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说明的论证,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和混乱。为了求得对一个命题原意的正确理解,罗教授居然前后延续了整整十个年头,一连写了三篇“辨文”。然而,近年来论争又有新的发展,不同理论观点对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时刻的影响具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罗教授可能还会联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问题的理论研究》和《从恩格斯为〈新纪元〉题词,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等论文,进一步研拟写出“四辨‘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文来。这表明力求准确地理解和表达经典作家的原意,是多么的重要而又何等的艰难啊!如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锲而不舍、务真求实的精神,坚持真理是难以做到的。可见,罗教授的这种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罗郁聪教授今年已七旬有七,但仍宝刀不老,壮志不减当年。他祈望一如既往地继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厦充当“论证大军”之一员,跟同志们一起为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做更系统深刻的科学论证,而竭尽自己的余力。因此,在庆贺罗教授新著面世之际,我衷心祝愿罗教授“成为一个善始善终的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③,为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胡岳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31页。

② 罗郁聪著《现代社会主义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51页。

③ 罗郁聪著《现代社会主义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454页。